

# 唐君毅與余英時的交往(上)

● 彭國翔

**編者按：**今年是唐君毅先生逝世四十五周年，8月是余英時先生逝世兩周年，作者撰寫此文以為紀念。由於篇幅關係，本刊將分兩期刊出文章，本期先刊出第一至三節。

## 一 引言

在學界一般的印象中，唐君毅(1909-1978)和余英時(1930-2021)這兩位人物，前者是現代新儒學的代表，後者則撰寫過〈錢穆與新儒家〉，不僅將錢穆(1895-1990)與現代新儒學劃清界線，並對現代新儒學提出過批評<sup>①</sup>。並且，在當年新亞書院併入香港中文大學後的「改制風波」中，前者與後者還處於不同甚至對立的立場。但是，作為新亞的三位創辦人之一(另兩位是錢穆、張丕介)和三位首屆畢業生之一(另兩位是張德民、陳式)，這兩位前後相繼的中國現代學術思想上的重要人物究竟有過哪些交往？應該如何理解兩人之間的關係？恐怕是學界大部分人未必了解和無從深入思考的。本文將首先根據唐君毅的《日記》(引用只註冊次和頁碼)以及《余英時回憶錄》(以下簡稱《回憶錄》，引用只註頁碼)等第一手相關文獻<sup>②</sup>，重建唐君毅和余英時的交往。在此基礎上，對於應該如何理解兩人之間的關係，也將提出自己的觀察，力求盡可能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釋。

對於兩人交往的考察，根據目前掌握的史料，可以分為三個時期：一、1950至1955年。唐君毅擔任新亞教務長，並講授中西哲學；余英時則在新亞求學。唐、余二人是師生關係。二、1956至1970年。唐君毅聲譽日隆，成為海外華人世界中國哲學的重要代表人物，於訪美期間曾和余英時見面，並有通信往來。余英時則從最初哈佛燕京學社的訪問學人，轉為哈佛大學的博士

研究生；1962年博士畢業後先在密歇根大學任教，1966年轉任哈佛並於次年獲得副教授的長聘資格，1969年成為正教授。三、1971至1978年。唐君毅先是邀請余英時回中大新亞主事，繼而1976年罹患癌症，於1978年辭世。余英時則先在1971年返回新亞訪問，1972年決定接任新亞校長，1973年正式上任，1973至1975兩年任期之間恰逢新亞改制事件。這是唐君毅和余英時交往的大體時間線，以下詳述兩人之間的交往事迹。

## 二 1950-1955：兩人同在新亞時期

1949年6月7日夜，唐君毅和其二妹一起，乘船離開廣州赴香港。8月24日至9月9日，唐君毅曾短暫返回廣州。但9月10日再度赴港之後，唐君毅便再也沒有回過大陸（《日記》，上冊，頁23、27-28）。唐君毅正式離開大陸到香港之後，最先和錢穆一道創辦的學校名叫「亞洲文商學院」，1950年3月則更名為「新亞書院」。當然，對於錢穆和唐君毅來說，亞洲文商學院和新亞是一脈相承的。也正因此，錢穆在其《新亞遺鐸》中，便將新亞的創立年代從1949年算起（《回憶錄》，頁100-102）。



新亞書院創立初期位於桂林街的校舍。（圖片來源：陳方正主編：《與中大一同成長：香港中文大學與中國文化研究所圖史，1949-199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0），頁16。）

余英時則是1950年元旦抵達香港的。他本來只打算利用寒假到香港探親，停留一個月之後便返回北京，繼續在燕京大學的學業。但後來由於家事需要處理，加之他也希望多陪伴家人，便請假一個學期，準備秋季開學再回北京。然而，就在1950年秋季開學返回北京的途中，當火車因故障停留廣州附近的石龍時，余英時的思想發生了改變。他決定回到香港，從此改變了一生的命運。也正因此，余英時把自己正式到新亞求學的時間從1950年秋季算起，而不是1950年的元旦（《回憶錄》，頁93-98）。

因此，從1950年起，唐君毅和余英時的人生便有了交集。不過，在唐君毅的《日記》中，余英時的名字要到1957年4月才開始出現。而那時已經是余英時1955年赴美近兩年之後的事了。那麼，1950至1955年，唐君毅和余英時同在新亞期間，是否有過交往呢？

雖然唐君毅的《日記》中直到1957年才出現余英時的名字，但余英時在晚年撰寫的《回憶錄》中，卻對自己1950至1955年在新亞求學期間是否和唐君毅之間有所交往留下了寶貴的記錄。《回憶錄》第四章「香港與新亞書院」記述了他在求學期間的往事<sup>③</sup>。該章第一節「轉學新亞書院」的部分，專門有「唐君毅先生與新儒家的興起」一節。其中，我們可以看到余英時自述的他與唐君毅之間的關係。在余英時的筆下，唐君毅不僅在新亞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更對余英時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在這一節，余英時開頭便是這樣寫的：

錢先生雖是新亞的主要原動力，但是若沒有張丕介和唐君毅兩位創校元老的同心協力、艱苦與共，新亞書院是不可能維持下去的。據我在港五年的記憶中，張先生負責學校一切實務，相當於總務長之職，唐先生則總攬教務，相當於教務長。（《回憶錄》，頁111）

張丕介（1905-1970）的專業是經濟學，自新亞創校伊始，他便擔任經濟系主任，開設「中國經濟問題」、「土地經濟學」等課程，直至退休。余英時雖然和張丕介也很親近，所謂「他對中國文化傳統的重視和錢、唐二公一致，對於新亞學生的照顧也無微不至，所以我一直和他很親近」（《回憶錄》，頁111），但並沒有修讀過張丕介的課程。比較而言，余英時則不僅正式修讀過唐君毅的課程，更認為唐君毅對自己有過極大的影響。

如所周知，余英時多次在不同的場合與文字中指出，錢穆是對他影響最大的一位學人，後來則是他在哈佛的指導教授楊聯陞。不過，余英時特別指出，在1950至1955年的新亞時期，唐君毅在思想上對他的影響僅次於錢穆。他說：

但唐先生在思想上對我的影響僅次於錢先生，不能不稍作介紹。我曾修過他的西方哲學史課程，卻沒有隨他讀中國哲學史。這也許是因為我的興趣偏重在學術史、思想史方面，現在已記不清楚當時究竟為什麼沒有

聽他有關中國哲學的課了。我受他的影響，不在聽課，而是讀到他源源不斷的論著，包括專書和報刊論文。此外他作過多次公開學術講演，也對我發生了很大的啟示和挑戰。（《回憶錄》，頁111-12）

不僅如此，余英時還引用了2008年他應邀為唐君毅銅像在中大落成所撰寫的銘文<sup>④</sup>，專門分析了唐君毅在新儒家作為一個學派的興起過程中所發揮的「最具關鍵性的作用」（《回憶錄》，頁115）。在余英時看來，不僅唐君毅個人

「一代儒學宗師的地位是在新亞書院這一特殊基址上建樹起來的」（《回憶錄》，頁112）；並且，作為一個學術思想流派的「新儒家」，也正是主要經由唐君毅的推動而建立起來的：



錢穆與唐君毅。（資料圖片）

海外「新儒家」有三位代表性人物，即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同為熊十力的弟子。其中唐、牟兩先生是專業哲學家，一生都是學院中人，而徐先生則處於「學術與政治之間」，中年以後才從政界轉入學界，因此一般文化界人戲稱為「二聖」（唐、牟）「一賢」（徐）。他們三人最初分居兩地：唐去香港新亞，牟和徐則執教於台灣的東海大學，雖然彼此聲氣相通，但畢竟不能朝夕切磋，商量道術。所以幾年後，唐先生運用他在新亞和香港學術界的巨大影響力，先將牟先生從東海搬來香港大學中文系，再進一步聘他入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哲學系。徐先生從東海退休後也移居香港，唐先生則安排他在新亞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二聖一賢」合在一處，「新儒家」終於在新亞

書院建立起它的基地。從一九六〇年代末到一九七八年唐先生逝世，以新亞為中心的「新儒家」達到了巔峰狀態，引起國際學界的重視。（《回憶錄》，頁115-16）

這一觀察和判斷是以余英時的親身見證為基礎的。1975年5月中旬，哈佛的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教授在牛津大學講學之後，到香港訪問新亞。他特別表示想和「新儒家」諸公會面一談。經過安排，他和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三位及其門人輩在新亞研究所進行了一個下午的討論。當時從哈佛請假兩年到新亞擔任校長的余英時因校務繁重，未能與會。但第二天史華慈很興奮地對余英時說：新亞擁有這樣一個獨特而又富於高度原創性的思想流派（an unique and highly original school of thought），值得引以為榮。余英時了解史華慈從不說客套話，因此，這番發自真誠的評語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令其一直不忘（《回憶錄》，頁116）。所以，他在《回憶錄》中也特別記下了這件事情，作為唐君毅所大力推動的新儒家學派當時已經在國際學界引人注目的一個見證。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余英時認為，「從一九五〇至七〇年代，如果我們說唐先生是海外中國人文學界最富於創造精神的領袖之一，他是絕對當之無愧的」（《回憶錄》，頁114）。

而在「唐君毅先生與新儒家的興起」這一節的最後，余英時再次強調新亞時期唐君毅對他的巨大影響：

總之，我就讀於新亞書院五年，唐先生有關中西文化精神價值的比較和概括，大致都耳熟能詳。我雖然未能追隨他形上思維的道路，但每次讀到他的論著，都逼使我對許多問題重作探索和思考。所以除了錢先生之外，唐先生在學術和思想兩方面，對我的啟發是既深且遠的。（《回憶錄》，頁116）



余英時與錢穆。（資料圖片）

《回憶錄》是余英時親筆撰寫的，在他逝世前三年出版，可謂其「晚年定論」。僅從上引文字便可看到，余英時對唐君毅是非常尊重的。即便在1973至1975年新亞的改制過程中，雙方因所處位置不同而意見不一，也並沒有使師生情誼破裂。所以，1977年余英時赴香港接受中大頒發的法學榮譽博士學位時，還曾主動與唐君毅的學生唐端正一道，專程去看望已在病中、次年即去世的唐君毅。據余英時說，兩人「也沒有再談什麼新亞的事情。我跟他談得很愉快，這是一個學生跟老師的關係」<sup>⑤</sup>。這些後來的交往，後文再做專門的交代，此處不贅。

在這一歷史階段，還有一件兩人之間發生過的交集，不僅在唐君毅的《日記》中未有記錄，余英時也是直到撰寫《回憶錄》時才提及。因此，以往學界似無人知曉。但因恰好事關兩位，且發生在二人同在新亞期間，故值得一提。

1954年，哈佛燕京學社創立了「訪問學人計劃」。根據這一計劃，學社每年將聘請中國、日本、韓國的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中的學人到哈佛進行為期一年的訪問，最初每年招收十一二位訪問學人。訪問學人有聽課和研究的自由，沒有考試及其他方面的義務。這一計劃創立伊始，便將新亞納入其中。但是，1954年書院推薦的候選人陳伯莊(1892-1960)因年齡超過要求，未被學社選中。到了1955年，書院仍然沒有符合三十到四十歲之間這一年齡要求的候選人，於是同時推選了唐君毅和余英時，由學社自行抉擇。就年齡而言，當時唐君毅四十六歲而余英時二十五歲，前者過之，後者不及。但訪問學人計劃的重心是獎掖年輕學人，加之上一個沒有錄取書院推薦的候選人，所以1955年便在唐君毅和余英時兩位候選人之中，破例錄取了年齡不及的余英時。這一故事，可以說是兩人在新亞期間，除了師生關係之外極為難得的一次交集(《回憶錄》，頁152-54)。儘管這一次唐君毅未能赴美，但在兩年之後，他不僅得以訪美，而且在波士頓和當時已在哈佛攻讀博士學位的余英時重逢。

### 三 1956-1970：唐君毅兩次訪美及余英時在美期間

在1956至1970年這段時間，唐君毅有過兩次訪美經歷。第一次是1957年2月24日至7月23日(《日記》，上冊，頁188-203)。這五個月中，唐君毅「給夫人寫信近三十封，內容涉及各方面，既有自己參與的活動，拜見的人員，日常的生活，學校的事務，家庭的事務等等，也有自己對美國的諸多觀感」<sup>⑥</sup>。第二次是1970年8至9月，應狄培理(W. T. de Bary)之邀，唐君毅參加9月6至12日在意大利科莫(Como)舉辦的十七世紀中國思想會議<sup>⑦</sup>。此前唐君毅8月11日先抵夏威夷，13日乘機至芝加哥轉印第安納，參加了16日女兒唐安仁與女婿王清瑞在印第安納大學舉行的婚禮；隨後在親人陪伴下經芝加哥到多倫多，遊覽加拿大，參觀大瀑布；28日到波士頓；9月1日先赴倫敦，3日至巴黎，5日至日內瓦，6日抵達科莫(《日記》，下冊，頁168-69)。在1957和1970年的兩次訪美期間，唐君毅和余英時均有見面。

余英時1955年10月至哈佛燕京學社時，是訪問學人的身份，本來最多只會在美國兩年。但由於家庭的原因(《回憶錄》，頁179-80)，1956年秋從訪問學人轉為正式的博士研究生，跟隨楊聯陞攻讀中國古代史的博士學位。唐君毅1957年8月初訪哈佛時，余英時尚在攻讀博士期間。而十三年之後，唐君毅再至波士頓時，余英時已經是哈佛東亞系的正教授了。

對於1957年首次較長時間的訪美經歷，唐君毅在7月17日的日記中曾有如下的記載：

此次來美計在 Annapolis 前後七星期，在芝加哥、New Haven、紐約各約三周，在華盛頓約住二星期餘，共十二處。赴哲學會二次，遠東學會一次。對中國學生講話三次。在哲學班談話三次。雅禮協會講話一次。寫文四萬餘字。閱西哲書約五六冊。為新亞向亞洲協會接洽捐書。交涉韓裕文遺書贈新亞。向國會圖書館及芝加哥圖書館洽與新亞交換書。與雅禮協會人士接觸。與新亞各地同學晤面有孫述安、王明一、董保中、余英時、朱學禹、羅榮莊……（《日記》，上冊，頁202-203）

這段話概括了唐君毅訪美五個月期間主要的活動，省略的部分還包括與在美哲學家、治中國哲學者晤談的名單，以及參觀二十二所大學和數間博物館的名稱。像這樣一長段的文字記錄，《日記》中是較為少見的。需要指出的是，其中「寫文四萬餘字」中的「文」，主要正是指〈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這篇後來被視為現代新儒學綱領性的文章（除〈宣言〉外，還包括〈告新亞第六屆畢業同學書〉，前者三萬四千字，後者五千字左右）。該文雖然由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和張君勱四人聯名，但執筆人是唐君毅。此外，這段話中唐君毅列出了與其晤面的「新亞各地同學」的名單，其中正有余英時的名字。而根據唐君毅的《日記》和其他文獻史料，對於兩人見面的情況，我們可以獲得更為具體和清晰的了解。

在1957年4月3至7日的日記中，唐君毅有如下的記載：

三日 晴 上午至 Sheraton Hotel 參觀遠東學會（今改名亞細亞研究會），開會宣讀論文。下午余英時來，與之同至哈佛東方圖書館，六時返旅舍。

四日 晴 上午至遠東學會，晤見 Hocking 教授之女 Mrs. Kracke 及梅貽寶。十一時至 Cambridge Bucher 處。Hocking 自他處來，彼已八十四歲，今日乘七時半車來相晤，心中甚不安。彼對中國甚好，故來談約二小時並約在一處午餐，餐後又至遠東學會會場，五時回旅館。與廷光、王惕亞、朱學禹各一函。余英時來同至劍橋，夜宿 Ymea 在英時處晚飯。

七日 陰 上午英時送我至機場乘機至 Ithaca，下午三時到 Cornell，Bruska 來接，住該校客房中。（《日記》，上冊，頁193）

從唐君毅的記錄來看，他在上述三天和余英時都有見面。這應是1955年10月余英時離開香港之後兩人的初次重逢。顯然，4月3日那天，余英時在唐君毅上午會後，特意去迎接唐君毅，陪同他到哈佛東方圖書館參觀。4日，余英時再次到唐君毅的旅館迎接，陪同他一道再至劍橋。這天晚上，唐君毅在余英時處吃了晚飯，顯然是應余英時的邀請。而7日上午，唐君毅離開波士頓赴康奈爾大學訪問，則是余英時送他到機場。在《日記》中，關於這三次見面的記錄都是極為簡略的。不過，對於4月4日唐君毅在余英時處晚飯一事，余英時的《回憶錄》中提供了進一步的佐證。

1956年7月起，余英時和好友邢慕寰在哈佛街 (Harvard Street) 合租了一所公寓。除了一起去市場購買食材，兩人日常生活的分工是邢慕寰負責烹飪，余英時承擔清洗食具和整理廚房、飯廳的工作。在回憶邢慕寰「相當高明」的烹飪功夫時，余英時特別提到自己記憶最清楚的兩次：「一九五六年款待他的友人周鴻經先生（曾任中央大學校長和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一九五七年春季接待我的老師唐君毅先生。這兩位貴賓都從頭到尾稱賞不已。」（《回憶錄》，頁164-65）余英時回憶接待唐君毅一事，只寫了「一九五七年春季」，並無具體日期。但是，把他的回憶和上引唐君毅1957年4月3至7日的日記記錄兩相對照，恰好完全吻合。由此可以斷定，唐君毅所記4月4日晚「在英時處晚飯」，應當就是在哈佛街余英時和邢慕寰合租的公寓裏，應余英時的邀請而由邢慕寰下廚的經歷。

唐、余兩人1957年的見面，既是唐君毅初次訪美，也是余英時兩年前離開香港之後首次見到自己新亞的老師，彼此之間重逢的喜悅之情是可想而知的。而到了1970年8月，唐君毅第二次訪美，兩人再次在哈佛見面。8月29至30日這兩天的日記裏，唐君毅寫道：

廿九日 晴 余英時約中飯，晤見王浩。

三十日 晴 余英時約晚飯，晤見楊聯陞及Boxter、梅祖麟。（《日記》，下冊，頁169）

如前所述，余英時1962年取得哈佛博士學位，1962至1966年在密歇根大學執教四年之後，在楊聯陞的支持下，於1966年回到了哈佛任教。第二年余英時便獲得了副教授的長聘，1969年又升等成為哈佛的正教授。這次和唐君毅見面，29日約請中飯，次日又約請晚飯，足見余英時對唐君毅的熱情款待。

唐君毅的日記一般都極為簡潔，只是記錄了和余英時8月29、30日這兩日的會面。至於他們談了些甚麼，《日記》中並無透露。不過，從余英時後來的回憶以及1970年新亞的局勢來看，很可能唐君毅已經在醞釀請余英時返回新亞接任校長一事了。

1963年，新亞書院、崇基學院、聯合書院三所機構獲得港英政府的財政支持，聯合組成中大，成為香港大學之外的第二所大學。不過，雖然合併為一所大學，新亞也已經算是中大的組成部分，三所機構採取的卻是「聯合制」的組織形式，彼此之間相對獨立，新亞仍然可以按照當初成立時的方針和政策運作。但是到了1970年，在港英政府的要求以及縮減經費的政策之下，時任中大校長李卓敏已經準備將「聯合制」改為「單一制」，也就是將原本屬於各書院自己的管理權收歸大學校方。對此，唐君毅在1970年4月7日、15日、17日和23日這四天的日記中均有記錄：

七日 晴 標點改文五時，下午中文大學會議，我發言評及政府不應縮減大學發展經費。



十五日 晴 上午上課二時，下午李卓敏到新亞談話，彼欲利用政府縮減經費，擬變大學之聯合制為單一制。

十七日 晴 上午標點文並至中大開會，下午新亞教務會，我提議保持新亞及他二校聯合制度，夜標點文三時，初次標點完。

廿三日 晴 上午學生為抗議大學經費縮減罷課，寫信二封。(《日記》，下冊，頁161-62)

除了這樣的一種局面之外，1970年唐君毅已經六十一歲，按照中大的規定，距離六十五歲退休年齡只有四年。因此，在當時的情況之下，唐君毅會考慮新亞的接班人問題便是再自然不過的了。而作為新亞的首屆畢業生、擁有哈佛博士學位並且已經在哈佛擔任正教授的余英時，成為唐君毅心目中在中大這一新的格局中接掌新亞的不二人選，恐怕也是順理成章的<sup>⑩</sup>。事實上，1971年8月余英時即以訪問的方式回到新亞，而唐君毅等新亞元老，也正式向余英時提出了返回新亞接任校長的邀請。

除了1957年4月和1970年8月兩人的直接會面之外，在1956至1970年間，唐君毅還至少有五封給余英時的書信。這在其《日記》中也有記載：

[1957年7月]五日 晴 閱 Sartre 書一百頁。與沈燕謀、余英時各一函。(《日記》，上冊，頁201)

[1960年10月]一日 晴 上午上課二時，下午校文一時，睡二時許，因連日事多甚倦，夜覆奚會璋、陳負東、余英時各一函。(《日記》，上冊，頁281)

[1967年12月]廿一日 晴 上午寫信二封與楊聯陞及余英時，為研究所事也。(《日記》，下冊，頁111)

[1968年3月]十四日 晴 標點陽明與朱陸異同文完。與余英時一函。晚補作結論二千字。(《日記》，下冊，頁116)

[1969年3月]八日 陰 上午整理雜物，並與余英時一函談研究所事。(《日記》，下冊，頁138)

1957年7月5日，唐君毅尚未離美。其他幾封書信，則都是寫自香港。由此可以推知，唐君毅和余英時平時也有書信往來。可惜的是，《唐君毅全集》的《書簡》中並未收錄他給余英時的書信。最近出版的《余英時書信選》中<sup>⑪</sup>，也沒有收錄余英時給唐君毅的書信。不過，從這裏唐君毅《日記》的記錄來看，由於1963年中大已經成立，新亞的前途問題已然存在並且日益明顯，在1967年12月21日、1968年3月14日和1969年3月8日給余英時的三封信中，唐君毅多半已經和他探討了新亞的問題。「為研究所事也」以及「談研究所事」，都是明證。並且，1967年12月21日那天，唐君毅不僅寫信給余英時，也寫信給楊聯陞，兩信均是「為研究所事也」。這就表明，對於唐君毅來說，

新亞之事已經提上了日程。在這種情況之下，唐君毅1970年8月底在哈佛再次見到余英時的那兩天，已經向他提議接任新亞校長之事，便完全是有可能的。

事實上，就在余英時1971年8月回到了闊別十六年之久的香港、到新亞訪問之前不久，唐君毅3月22日又有一函給余英時（《日記》，下冊，頁182）。雖然日記並未記載信中何事，但推測其中必有關於余英時接任新亞校長一事的內容，恐怕雖不中亦不遠矣。（未完待續）

### 註釋

- ① 余英時：〈錢穆與新儒家〉，載《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台北：三民書局，1991），頁31-98。
- ② 唐君毅：《日記》，上、下冊，收入《唐君毅全集》，第三十二、三十三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
- ③ 余英時1950年3月至1952年6月在新亞完成了大學的學業，從1953年秋至1955年夏，在錢穆創設的新亞研究所進一步接受錢穆的指導，從事中國歷史研究，直到10月離開香港赴哈佛深造。
- ④ 銅像於2009年5月在中大正式落成，余英時的銘文就刻在銅像的基座之上。當時伴隨銅像落成典禮的，是中大哲學系舉辦的「中國哲學研究之新方向——中大哲學系創系60周年紀念、唐君毅百歲冥壽暨新亞書院六十周年院慶」國際學術研討會。筆者參加了那次會議，不僅親眼見證了銅像的落成，也親證了現場播放中大校方事先錄製的採訪余先生的錄影。銘文參見余英時：〈唐君毅先生銅像贊〉，載《情懷中國：余英時自選集》（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0），頁233-34；〈唐君毅先生像銘〉，載謝廷光等：《紀念集》，下冊，收入《唐君毅全集》，第三十八卷，頁470。
- ⑤ 余英時口述，李懷宇整理：《余英時談話錄》（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21），頁56。《余英時談話錄》是在余英時逝世之後出版的，雖未經本人親自校訂，但底稿根據余英時生前錄音整理，仍可作為《回憶錄》的補充。
- ⑥ 何仁富、汪麗華：《年譜》，收入《唐君毅全集》，第三十四卷，頁188。當然，這一次唐君毅不只是訪問了美國，赴美之前和離美之後，他還訪問了日本（2月10至23日）和歐洲（7月24日至8月28日）。正如他自己在8月27日的日記中記載：「此行共二百日，歷地二十五處，上下飛機三十次，平均留一地只一周即又赴他處，故殊感勞頓。」參見唐君毅：《日記》，上冊，頁207。
- ⑦ 關於唐君毅和狄培理的交往，參見彭國翔：〈唐君毅與狄培理的交往〉，《獨孤九劍》微信公眾號，2023年2月3日；《勿食我黍》微信公眾號，2023年2月4日。
- ⑧ 據唐君毅的女兒唐安仁回憶，唐君毅在新亞聘任教員時，比較傾向於出身新亞的人士，唯一的例外是唐安仁。當她在美國取得學位之後申請中大的教職時，作為最後的兩位候選人之一，卻被唐君毅以避嫌為由淘汰了。參見唐安仁：〈吾父吾師〉，載謝廷光等：《紀念集》，下冊，頁567。
- ⑨ 余英時：《余英時書信選》，收入《余英時文集》，第二十七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2）。